

论《史记》对魏晋六朝志怪小说的沾溉

马雅琴

(渭南师范学院 中文系 陕西 渭南 714000)

[摘要] 《史记》以历史、现实传说内容为主,同时有志怪成分。它保留、改造了一些神话传说,记载了来自民间的神异传闻。《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从汉魏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志怪小说家多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作。志怪小说在思想观点和叙事方法上继承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关键词] 《史记》 志怪小说 继承 发展

[中图分类号] K20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2006)11-0123-03

《史记》是一部史传名著,虽然它与志怪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艺术门类,但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1]史传是中国小说的母体。仔细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我们认识《史记》的伟大价值,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志怪小说的基本特色。

一、《史记》的志怪成分及其产生原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它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太初年间大约三千年的历史。综观《史记》,我们不难发现,《史记》是以历史、现实为主,同时也有志怪的成分。

《史记》是历史著作,为何会有志怪倾向?这种现象的产生,是有其主、客观原因的。从主观方面看,司马迁是一个富有浪漫气质的文学家,所以在《史记》写作中,表现出“爱奇”的倾向。汉代扬雄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认为司马迁有“爱奇”倾向。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也认为司马迁“爱奇反经之尤”。正因为司马迁“爱奇”,所以在《史记》中,收集、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异闻。司马迁之所以特别注重奇人奇事,这也与他个人的不幸遭遇有很大关系。司马迁因李陵之祸,惨遭腐刑,这对富于进取、热衷于建功立业的司马迁来说,无疑是最悲惨的命运。为了雪耻,为了向社会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把撰写《史记》这一历史使命看得比自己的人格尊严还重要。现实中建功立业的愿望破灭了,司马迁就把自己的理想追求寄托在这些奇人身上,这些奇人就是自己理想的化身。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著作宗旨,使他用文学手法写人写事。司马迁在《史记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反复申述自己创作《史记》的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内容丰富多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要借重于《史记》的文采流传万世,从而洗清耻辱。季镇淮先生在《司马迁》中评论道:“司马迁从根本的实录精神出发,首先他要选择和识别人物,从而选其可信的和重要的事件,适当地安排、剪裁,并加以一定的具体描写,这是司马迁写作历史人物传记的一个创造性的、典型化的过程。”季先生的话,说明了《史记》写人叙事,注重文学色彩。《史记》中的怪异成分也给历史记述增添了光彩。

从客观方面看,司马迁所处时代,正是汉武帝时代。这是一个充满浪漫、充满精神和活力的时代。表现在文坛上,既出

现了气象宏大、极尽想象、夸张之能事的汉大赋,又出现了豪迈雄放、气势磅礴的论说文。而《史记》中的志怪倾向、奇人奇事就是这种浪漫精神的具体表现。《史记》的志怪倾向,继承了先秦文学、史学的传统。我国的远古神话,丰富、瑰丽,记载了许多天神、怪异的故事,是我国浪漫主义的源头。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庄子》,充满了奇幻而丰富的想象。屈原的《楚辞》把浪漫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先秦时代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虽以记述历史为基础,但也有许多神话、鬼怪等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无论是文学家还是史学家,都对神话传说充满了浓厚兴趣,而且从总体上表现出把神话传说视为历史的趋向。《史记》的志怪倾向,正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史记》的志怪倾向,也体现了时代的局限性。在殷商时代,有神论的天命思想占统治地位。西周末年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民本思想。到了汉代,虽以人为主体的,但人们仍相信天命鬼神。《史记》中的志怪成分,说明了作为汉代史学家、文学家的司马迁,必然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

二、《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

志怪小说的源头,可追溯到远古的神话。神话是原始宗教的产物,是人类早期的不自觉的艺术创作。古代神话包罗万象,大到宇宙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祖先的创世,小到草木禽兽的来历、劳动工具的创造等,都成为神话涵盖的内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因为希腊神话的精神与文体对后代欧洲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我国的志怪小说在精神上接受了神话的浪漫主义,但在文体上却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因为我们说的神话,只是指神话的内容,它的文体形式已无法考知。

先秦时期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战国策》,真实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历史,但也不乏怪异色彩。清人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评论道:“千古文字之妙,无过《左传》,最喜叙怪异事,予尝以之作小说看。”但是《左传》毕竟不是小说,不是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因为从体例看,《左传》属于编年体史书,它以时间为纲,历史人物的活动受时间的严格限制,它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是零散的、片断的。但是,《左传》在志怪小说成长的历史长河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史传文学的代表,志怪小说产生的土壤,《史记》吸收了《左传》的养料。

《史记》是志怪小说产生的母体。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成为先秦文化之集大成者。司马迁开创了我国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文学,第一次把文史巧妙地结合,打开了史学通向文学的门户。因此我们可以说,从神话到史传再到志怪小说,《史记》起着承前启后的桥梁作用,它不但中国史传的经典著作,而且是中国叙事文学历史上的里程碑。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是我国最早的小说形式。从魏晋六朝时期小说家创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志怪小说家仍未完全摆脱《史记》叙事文的影响,仍视小说为史家之附庸,多以史学家司马迁的实录原则来规范小说创作,并未将其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自觉地去进行创作。有名的《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作品的篇名,与《史记》相仿,都有“记”、“传”二字。《搜神后记·丁令威》云:“丁令威,本辽东人,学道于灵虚山。”接着叙述了丁令威学道成仙,化鹤归乡的事迹。其它如《搜神记》、《列异传》、《神仙传》等作品叙事的基本格局,与《史记》人物传记一脉相承。程千帆先生在《先秦文学源流论略》一文中云:“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杂传,是指史传以外的所有记传。实际上,志怪小说、志人小说亦属于杂传作品,它们均受以《史记》为代表的史传文学的影响而产生。明人吴纳《文体辨体序》云:“太史公创《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迨前后两《汉书》、三国、晋、唐诸史,则第相祖袭而已。厥后世之学士大夫,或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湮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可为法戒者,因为立传,以垂于世,此小传、家传、外传之例也。”也说明了从艺术渊源上分析,杂传无疑是受到了《史记》等史传文学的影响。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认为:“小说,正史之余也。”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所以传统目录学家始终把小说看成是史传的附庸。《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中,把一部分志怪小说也归于史部。而唐前的史传文学《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都是在《史记》体例影响下产生的史传文学,它们对神话、传说、异闻的记载,无论从广度、深度,还是系统性、生动性方面,都不能与《史记》比拟。所以我们说,《史记》是志怪小说的母体,是它产生的土壤。

志怪小说的产生,还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佛、道盛行,产生了很多谈神仙、鬼怪、隐士、异人的故事,经文士们的采撷、编写,就形成了杂谈怪异的志怪小说。志怪小说萌芽于远古神话,在历史的征途上,它蹒跚而行,久久不能脱颖而出。《史记》哺育了志怪小说,而且在志怪小说成长的征途中,不断供给其丰富的营养,使它健壮成长。

三、志怪小说对《史记》的继承与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宣扬鬼神,称道灵异的志怪小说,现存有三十余种。其中较有名的有托名汉东方朔的《神异经》,托名晋陶潜的《搜神后记》,张华的《博物志》,祖冲之的《述异记》,王嘉的《拾遗记》,王琰的《冥祥记》,葛洪的《神仙传》,刘义庆的《幽明录》,颜之推的《冤魂志》,吴均的《续齐谐记》,戴祚的《甄异传》等。其中,干宝的《搜神记》代表着这个时期志怪小说的最高成就。《史记》孕育了志怪小说,志怪小说继承

发展了《史记》的传统。

(一)《史记》在思想观点上启迪了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鞭挞统治阶级的残暴、揭露贪官酷吏罪恶的优良传统。司马迁在《史记》中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敢于揭露历史上许多暴君如桀、纣、周厉王、秦始皇等的暴政暴行,而且敢于直接抨击当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及在位帝王汉武帝。这种仗气直书,无所阿容的批判精神,在封建时代的史学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志怪小说的作家们用自己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搜神记·韩凭夫妇》暴露了统治者荒淫凶残的本质。《搜神记·干将莫邪》抨击了统治者的暴虐凶残。《述异记·封邵》揭露了官吏吃人的本质。《冤魂志·弘氏》披露了官吏枉杀无辜的罪行。志怪小说歌颂了反抗暴政的英雄人物。《干将莫邪》中那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言必信,行必果,牺牲自己反抗强暴的侠客,不正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荆轲、专诸、曹沫、聂政、豫让侠义行为的再现吗?在《史记》中,司马迁对凡是在政治、军事、文化、科学等各个方面有过贡献的人,以及具有高尚品德的人,都为之立传,并充分肯定他们。志怪小说也从各个方面对劳动人民善良、勤劳、勇敢、聪明的品质进行歌颂。《搜神记·李寄斩蛇》塑造了一个智勇双全、气概非凡的少年女英雄李寄的形象。《列异传·宋定伯卖鬼》反映了劳动人民不怕鬼怪,勇于铲除妖魔的大无畏精神。《搜神后记·白水素女》歌颂了勤劳善良的仙女白水素女。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司马迁爱奇的思想。首先,志怪小说吸取《史记》的传奇色彩。《搜神后记》多谈神仙,《列异传》重记鬼怪;《博物志》长于神仙、方术妖异的记述。志怪小说在写人叙事时,常有离魂、梦幻、死而复生、天女下嫁、人鬼结合等离奇的情节,又有象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等神奇的故事。其次,吸取了司马迁对奇人推崇与偏爱的思想。在《史记》中,司马迁为我们展现了一道丰富多彩的悲剧英雄人物的画廊,而这些人物正是司马迁歌颂的奇人。志怪小说的作者,不仅赞颂奇人,推崇奇人,而且猎奇为文。宋定伯、干将莫邪、李寄等人物,无不充满传奇色彩。

(二)《史记》在叙事方法上影响了志怪小说

《史记》的纪传体结构,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的技巧,以及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述方法,为志怪小说提供了基本的叙事模式。

志怪小说在体裁上大都采用纪传体结构。《史记》首开纪传体写人的结构。《史记》中的许多人物传记结构都可分为开头、中间、结尾三部分。开头多介绍人物的姓氏、籍贯、职业等,先给人留下总体印象。中间详尽记述人物的主要事迹。志怪小说从篇名到整个艺术结构,都与《史记》相仿。所不同的是,志怪小说决不对主人公的生平作纪年式的记叙,只选取主人公一件完整的故事,它更关注的是故事的生动离奇。它的创作原则是实录,常常通过想象和虚构的文学手法,以达到弘扬神道的宗旨。

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注重特异性故事情节描写的技巧。司马迁为了突出“奇人”的精神风貌,在描写叙事时,善于选取特异性的故事,特异性的场面。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萧何月下追韩信,张良遇黄石公,荆轲刺秦王等等。志怪小说继承发展了《史记》的方法。志怪小说是用故事来宣传神道,在叙事时不仅讲究故事完整,还注重选择离奇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作家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探析

田金长

(陕西教育学院,西安 710061)

[摘要]二十世纪‘60年代人’完全指向自身的精神索求无法使他们建立一种对世界的新的观念,成为精神上的流浪汉。他们的兴趣在于抓住当代生活的外部形体,在同一个层面上与当代生活同流合污,真正以随波逐流的方式,逃脱文学由来已久的启蒙主义梦魇。

[关键词] 个人主义 六十年代作家 表象化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6)11-0125-03

“60年代人”(在这里,我们将不通过对“命名的时间游戏”做是非非的赘述,而只将它作为一般的约定俗成的概念予以接受)具体是指这样一批作家:鲁羊、述平、何顿、韩东、邱华栋、刁斗、东西、海南、徐坤、刘继明、张炜、毕飞宇等等。他们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60年代,在90年代尤其是94年之后活跃于文坛,并在诸如“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连展”“跨世纪星群”等展览式的炒作

中忙碌地登场亮相。继编辑王干首先送给他们一个“新生代”的名号之后,他们还被亲切地称为“晚生代作家”、“文革后作家”。但不管是哲学型的鲁羊、刘剑波、毕飞宇、东西,还是私语型的陈染、林白、海南,抑或写实型的何顿、张炜、朱文、韩东、邱华栋、述平、徐坤,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沉醉于边缘。所谓边缘,正如陈思和先生在《试论九十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中表述

的,现时代的作家除了选择在相对多元的文化格局里履行自己的人文理想和社会责任或者选择走民间道路外,还有些作家会在拒绝时代共鸣以后,自觉置身于社会边缘的立场,坚持以个人的感情世界为视角,表达与社会的尖锐对立。对于“60年代人”,个人叙事的张扬,社会叙事的终结,其实并非仅仅是一种选择,更多的,它也是一个拯救与解构交互混杂的时代、一个“自言自语”的时代、一个

的情节,特异的场面。如人头跳起,颈血逆流,魂化鸳鸯等神奇的情节。想象奇幻,内容新奇怪诞,人物奇特,真可谓出奇无穷。《史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在符合生活逻辑、符合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司马迁对所写人物所写事件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发挥,但它的艺术发挥,是以真实作为基础。而志怪小说则不同,它的艺术发挥可以任意驰骋,天上人间,神仙鬼怪,无所不能。志怪小说继承了《史记》立体化写人记事的叙述方法。在《史记》中,作者本人时而幕前,时而幕后,无处不在,无所不评,不但知道任何人物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干什么,而且知道任何人物所处时代环境,任何人物的内心隐秘,并且善于使用感情倾向显露的语言表达出自己的感情。《项羽本纪》中,作者不仅知道项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也知道他是一位随意杀人的屠夫,既目睹了鸿门宴惊心动魄的斗争,又亲见垓下慷慨别姬的凄婉,字里行间,表达出作者对项羽这个失败了的英雄人物的喜爱与同情。志怪小说不仅直接继承了这种叙述方法,有的在时间和空间的处理上进行了富有想象的创造。在志怪小说中作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时空自由翱翔,任何隐秘的角落,作者都能窥视到。《干将莫邪》、《韩凭夫妇》、《酆璞》即是。志怪小说的作者,有时为了把幻境写成煞有其事,使人尽信无疑,于是在他们的作品中,便着力

描写当事人的亲见亲闻和亲历事件的主观感受,通过人物的视野观察事物,而叙事者本人不能自由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叙事方法,是志怪小说对《史记》叙事方法的突破与发展。

志怪小说吸取了《史记》插入诗歌谣谚表情达意方法。司马迁在写人叙事时,为了更好地表现人物的内在情感,插入许多诗歌、歌谣、谚语,清新自然,使《史记》锦上添花,《项羽本纪》中的“垓下歌”,唱出了英雄末路的悲哀。《李将军列传》中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民谚,表现了对李将军的敬仰。《荆轲列传》中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把慷慨悲壮的情绪推向高峰。志怪小说在记叙神仙怪异的故事时,直接吸取了《史记》这种表情达意的方法。虽然志怪小说篇幅短小,但有些篇章笔触细腻,情节丰富,所插诗歌并非皆是佳作,但却使志怪小说更富光彩。

[本文为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06YKF006]

参考文献:

- [1] 李建国. 唐前志怪小说史[M].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 [2] 张大可. 史记全本新注[M]. 西安:三秦出版社, 1990.